



夏文化探索与夏代信史说



董琦

(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要:八十八年来夏文化探索的历程是学术界“多方寻求答案”的历程,也是学术界不断讨论“解决疑问”的历程。目前对学术界而言,夏文化仍然处在探索阶段。在探索夏文化的历程中,夏代信史说始终未超出夏文化探索的范畴,与历史时代的信史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夏代信史的确证过程中,考古学方法再重要,也不要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夏文化探索; 夏代信史说; 夏代文字材料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Xia cultural exploration in the past 88 years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seeking answers with all method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ut is also a course of discussing "how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t present, the study on the Xia Culture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The research of Xia Dynasty's histor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istory. Although archaeology methods are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confirmation of Xia Dynasty's existence, we should never ignore or even exclude the key role of the discovery of Xia Dynasty writing materials.

Key Words: Xia Culture Exploration; Belief of Xia Dynasty's Existence; Xia Dynasty writing materials

特
别
关
注

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为夏文化探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从徐中舒先生的著名论文《再论小屯与仰韶》发表算起^①,至今已有八十八年了。八十八年来,经过学术界的不懈地研究,夏文化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

探索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多方寻求答案,解决疑问。”^②应当说,八十八年来夏文化探索的历程,是学术界“多方寻求答

案”的历程,也是学术界不断讨论“解决疑问”的历程。

无论是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③,还是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说^④,可以看做是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的初步尝试。当然,以上学术观点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赵光贤先生的《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⑤一文很有代表性。

今年是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六十周年^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由此往后,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视线聚焦到了二里头遗址及其相关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发现发掘

当年(指1959年),即有学者提出二里头遗存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线索^⑦。反倒是领导1959年豫西调查“夏墟”的徐旭生先生,提出了二里头遗址为商汤都城说^⑧。此说一经提出,成为学术界二十多年的主流观点。

随着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深入,如何界定夏文化成为学术界的共识。1977年11月,“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召开,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在考古发掘现场探索夏文化的盛会。在这次会上,夏鼐先生首次提出对“夏文化”简要的界说:“‘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⑨即使如此,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意见,郑杰祥先生归纳了十种之多^⑩:1.河南龙山文化或其晚期为夏文化说,由于主张此说者认为二里头一期文化属于河南龙山文化范畴,因而此说也可称为河南龙山文化或其晚期阶段与二里头一期文化为夏文化说。2.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一、二期为夏文化说。3.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说。4.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说。5.二里头文化一、二、三期为夏文化说。6.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为夏文化说。7.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为夏文化说。8.晋南“东下冯类型”文化与“陶寺类型”文化为夏文化说。9.典型龙山文化(或称山东龙山文化)为夏文化说。10.东南良渚文化为夏文化说。我之所以将郑杰祥先生归纳的十种意见一一列出,是想说明这十种意见,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另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局限,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哪种考古学文化就是夏文化”^⑪。

1996年5月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第九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

目之一。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学科,组织52次多学科的学术讨论会。2000年10月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下面简称《简本》)^⑫。在探索夏文化时,邹衡先生曾经提出二个问题:1.“夏朝的总积年是说不清楚的,尽管有文献记载,但是彼此相差甚远,即使《古本竹书纪年》有‘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之说,一般又认为比较可靠,但这也只不过是极其粗略地估算而已,其年数并不可能准确,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受到约束”。2.“至于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算入夏文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不怎么合适的,因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毕竟不是一种文化,两者在文化内涵中并没有交错衔接。如果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那它的早期又是什么文化?恐怕也很难解释的”^⑬。《简本》是这样解说这两个问题的:“文献所见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471年说:……431年说:……。兹采用前一种解说”^⑭。“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之间尚有差距,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⑮。“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⑯。由此可知,《简本》是在用探索的口吻解说这两个问题的,可谓是一家之言。至于“新砦二期遗存”是否得到确认,是否“已将二里头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李维明先生历时6年著文8篇对所谓新砦期的论证讨论^⑰,质

疑新砦类遗存作为一独立阶段的存在,认为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紧密相连,性质不同,二者之间不存在缺环。

梳理八十年来夏文化探索的历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目前对学术界而言,夏文化仍然处在探索阶段。

二

信史一词,《辞源》释义:“纪事翔实的史籍”^⑩。《辞海》释义:“确实可信的历史。”^⑪《现代汉语词典》释义:“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⑫在数百篇的夏文化探索论著中,往往涉及夏代信史的问题。

徐旭生先生以长达三十年的持续研究,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⑬一书。徐旭生先生“把盘庚以前的时代叫做传说时代,以后的时代叫做历史时代”^⑭。并指出“因为《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两篇,《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三篇详细叙述五帝的系统及其相互间的血缘关系,夏、殷两代先公及先王的次序,所以这些说法在数千年的历史界也有很高的权威”^⑮。显而易见,《夏本纪》等篇尽管“有很高的权威”,还是些“说法”。徐旭生先生是肯定夏代信史的:“根据古史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同时他又认为,夏文化是个“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⑯。邹衡先生也坚定地认同夏代信史:“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中已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夏朝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怀疑乃至否定都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他又认为:“夏朝能否确证,只靠古代文献恐怕是独木难撑,运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找出夏朝的文化遗迹和遗物,才能最后确定夏文化。”^⑰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均是学术界著

名的专家,在学术界也有很高的权威,他们探索夏文化的论著中,涉及到夏代信史的问题,均主张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用考古学方法确定夏文化。也就是说,夏代信史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在探索夏文化的历程中,夏代信史说始终未超出夏文化探索的范畴。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探索的不是夏文化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他们均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先秦文献与西汉名著《史记》中已成定论。历年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铭文也佐证了他们的观点。如春秋时期的秦公簋,传 1919 年甘肃省天水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簋器、盖对铭,共 105 字。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 12 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另外,器盖上与器底侧分别留有秦汉时期的刻铭,记录了该簋在秦汉时期为西县官物,曾被当做容器使用^⑱。其中盖内铸铭称秦公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迹……虢事蛮夏”。又如西周中期的鬲公盨,传出自河南窖藏,保利艺术博物馆 2002 年在香港购回。该盨器内底有铭文共十行,除最后一行为 8 字外,每行皆 10 字,共 98 字^⑲。鬲公盨铭从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起,“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正如朱凤瀚先生所言,“确切证明了禹其人其事盛传于西周”^⑳。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探索的是什么是夏文化的问题,他们研究的成果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孙庆伟先生的专著《鼎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㉑,虽然对夏朝积年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认知与邹衡先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基本上遵循了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的研究方向。鉴于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现状,有的学者认为“因此夏代信史说也只是一种看法而已”^㉒,不谓不客观。我也认为夏代信史说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一家”的成员数量较多,但并不

能概括学术界的全部。为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我曾著文《二十年的论战》，并在文中指出：“邹衡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1—4期为夏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已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这毕竟是考古学上确定的夏文化。在考古材料中还没有发现有关夏、商年代的文字记录，尤其是还没有发现夏代当时的文字资料。因此，有的学者持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可以理解的。”^①”文章发表前，我曾到邹衡先生家中特意请教先生，上述这段文字表述妥当否，先生当即表示认可。

显而易见，在夏文化探索范畴之内的夏代信史说，与历史时代的信史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

夏代信史的问题有可能解决吗？“通过多学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发现，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可以从其他方面为夏问题贡献更丰富的内涵”^②。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是有没有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问题，而不是讨论夏代有没有文字材料的问题。正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夏代文字材料，在“夏墟”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就有商汤都城说^③与夏都斟鄩说^④。“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⑤”以此类推，安金槐先生断定的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就是夏文化遗存^⑥，也只是一家之言。

拜读最近出版的方勤先生专著《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

^⑦，深受启示。作者结合新出土曾侯與编钟铭文，确认曾国即《左传》等文献记载的随国，并依据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以及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对曾国历史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曾国与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诸侯国，两周时期地处今湖北境内的曾国，如果没有大量的青铜器铭文确证，单一依赖传世文献，方勤先生的专著就有可能改名为《随国历史与文化》，学术界也许会引发曾国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是随器或是楚器或是周器的讨论，或者还会引发曾国遗存是随文化或是楚文化或是周文化的大讨论。

综上所述，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夏代信史的确证过程中，考古学方法再重要，也不要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邹衡先生所说的“运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找出夏朝的文化遗迹和遗物”，理应包括夏代文字材料。

注释：

① 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期。

②③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325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③ 参见①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中国史论集》，第48页，文风书局，1947年。

④ 范文澜：《夏朝遗迹》，《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

⑤ 赵光贤：《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光明日报》1957年1月17日第3版。

⑥ a.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

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b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⑦ a. 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第10期；b. 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⑧⑨⑩参见⑥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⑨ 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⑩《夏文化论集》（上），前言第5~1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⑪《夏文化论集》（上），第18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⑫《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

⑬《夏文化论集》（上），序言第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⑭《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74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

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7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

⑯《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1~8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

⑰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第64~15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⑱《辞源》（修订本）第一册，第0211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⑲《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第28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

⑳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㉑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㉒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㉓《夏文化论集》（上），序言第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㉔《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图版说明第14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㉕⑳《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公布了此器的照片、铭文拓片以及李学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等先生的考释文章。

㉖孙庆伟：《鼎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三联书店，2018年。

㉗陈淳：《从考古学理论方法进展谈古史重建》，《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㉘董琦：《二十年的论战》，《考古学研究（五）》（上册），第41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㉙陈胜前：《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读书》2019年第2期。

㉚方酉生：《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三期遗存与桀都斟鄩》，《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㉛许宏：《最早的中国》，第5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㉜安金槐：《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㉝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